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智雯

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云南省传统产业基础雄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强劲,是云南的财税支柱和就业保

促进国资国企从“资源持有者”向“生态共建者”转型。其次要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不断完善民营经济政策体系和组织保障,设立省级民企转型升级基金,统筹深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协调解决重点民营企业、民间投资项目融资需求问题。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注重产业载体建设。载体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硬件基础”和“空间支撑”,通过优化产业布局与基础设施,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跃迁。首先要结合各州(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情况差异化定位园区产业发展目标,钢铁、化工等高能耗产业向滇中、滇西园区集聚,降低物流、用能成本,在沿边口岸布局跨境电商、建材加工基地等,拓展南亚东南亚市场,通过“园区化集聚”推动同类企业集中布局、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构建联合创新的产业生态。其次要完善硬、软配套基础设施,升级跨境物

障,但面临资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等挑战,新旧发展动能接续不畅。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仅是突破产业发展瓶颈、稳固经济基本盘的必由之路,更是加快建设具有云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政府通过战略规划、资源统筹和制度创新,可以有效破解转型困境,充当传统产业转型的“催化劑”。首先要高位规划,聚焦细分领域明确转型方向,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明确技术升级路线,引导企业集中资源突破关键领域,同时,各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优势选择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避免同质化竞争、内卷。其次

要统筹资源,利用专项债、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降低企业转型门槛,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同时,绘制产业招商图谱,针对短板环节定向引入龙头企业,实施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靶向招商,强化招商引资实效。三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营商环境,发扬“店小二”精神,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拿地即开工”模式,缩短项目落地周期,推行“负面清单+信用监管”的模式,释放企业活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绝非坦途,需直面内需不足、动能转化等重重挑战。但改革号角已经吹响,唯有在困难中找方法、在挑战中寻机遇,以产业转型升级为破局之刀,方能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云南要牢记嘱托,构建起“支持主体+注重载体+政府引导”三位一体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聚能。

(作者系云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实习生)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协同作用。国有企业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者”,民营企业则是“创新者”,着力构建起“国企主导+民企驱动”的协同共生格局,才能实现“1+1>2”的转型效能。首先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引领,支持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降本增效,激发内生动力;强化国有企业“链主”作用,积极布局延伸产业链,组建产业链联盟,带动中小民企链发展,强链支撑;开放国资国企科创平台,搭建国企、民企、高校与科研院所协同的产学研创新平台,

思政协堂

以提升数智素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田娟

2025年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坚持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战略性基础性工作来抓,合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青少年是成长于数智时代的“数字原住民”与“AI一代”。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数智技术已深度嵌入其社交、学习乃至自我认知的全过程,成为其认识世界的“底层操作系统”。然而,当前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步伐与技术迭代速度之间存在着明显“时差”。传统德育模式多聚焦于物理空间的面对面教化,未能充分回应数智场域带来的深刻变革。当青少年在算法洪流中面临信息迷失、价值模糊与思考权利让渡的风险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缺乏高阶数智素养的有效护航,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落实将面临严峻挑战。

数智素养源于数字素养,并已实现从技能操作向伦理共生的范式跃迁。它不再局限于如何上网,更关注如何与智能共存共荣,本质上是一种融合了技术认知、审辩式思维、情感态度与伦理判断的综合素养。我国《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这为素养培育指明了方向。要真正以数智素养筑牢立德树人的根基,关键在于构建贯通学校、家庭、社会与

数字平台的协同育人体系,系统性地实现价值引领、规则构建、能力培育与行为引导。

教育先行,数智素养融入学校教育。一是教师数智素养的“先行先试”。教师作为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关键力量,需率先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到素养培育者的转变。依据《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引导教师“愿用、会用、善用”人工智能,坚持以人为本,以专业素养与人文精神驾驭技术。教师需具备敏锐的“数智德育感知力”,能识别学生网络心理波动,并运用学生熟悉的语言(如网络热梗)进行价值引导。教师以开放探索的姿态拥抱新技术,示范人机协同、批判性评估AI输出并坚守伦理底线的过程,本身即是培养学生好奇心、适应力、审辩式思维与社会责任感的最佳示范。二是以“审辩式思维”为核心重构课程。教育要从教授技术操作转向培育审辩式思维。审辩式思维以理性标准和思维习性为指导,进行主动的、反思性的判断与决策。培育青少年的数智素养,首先,学校需要重构课程,开发跨学科的AI素养课程。这不仅仅是编程课,而是包含哲学、社会学的通识课。依据审辩式思维培养框架,需要在具体情境中,引导青少年分清事实陈述与观点表达,评估论证逻辑,清晰、准确地阐明信息的

意义和推理过程,提供理由与证据,结合情境进行反思与修正;重点培养青少年理解“AI的论证逻辑是什么”“数据是如何被收集的”以及“算法可能存在哪些偏见”等。其次,加大思维训练,推广“提示词工程”背后的逻辑训练。引导青少年在向AI提问时,学会多角度验证、学会质疑AI给出的答案。只有当他们具备了审辩式思维,才能在数字公民。需在德育课程中伦理前置,引入AI版权、网络暴力等前沿议题,通过案例教学明确虚拟空间的道德与法律边界。同时,唤醒青少年的主体意识,强调“人是技术的主人”,引导其警惕技术异化,在善用AI工具的同时,珍视人类的创造力、情感与道德自觉,并主动承担建设网络文明的责任。

提升养育者数智素养,构建家庭“数字契约”。家庭是数智素养培育的第一场域。父母数智素养是青少年德育的榜样,父母对待网络的态度决定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家庭要从简单限制走向共同规则与共同反思。加大家庭教育指导,推广“家庭数字契约”制度,将传统的家风家教转化为数智时代的规则共识。家长从单纯的“网络警察”转变为与孩子共学的“数字伙伴”,通过共同协商

屏幕时间、探讨网络热点,实现思想德育的数智化传递。另外,当前多数网站设有青少年模式,包括游戏网站的注册,家长需要严格遵守规则,让青少年模式真正守护青少年成长。

激活多元主体,构建“向善”的外部生态环境。立德树人需要健康的土壤。激活多元主体,构建支持性社会生态,推动社会环境与网络环境向善。首先,完善未成年人AI使用的法律法规,严格推行网络实名制与青少年模式;明确平台主体责任与算法问责机制。其次,落实平台的责任,算法向善,利用技术手段为青少年过滤有害信息,同时通过高品质的数字文化产品填充信息空间,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再次,扩大优质内容供给与正向实践渠道,让未成年人在现实社区生活以及数智空间中获得学习成长、公益参与与文化内涵的机会,把价值观培育与“全人发展”融入真实生活。

数智时代呼唤新的育人智慧。青少年数智素养的提升,不仅是一场关于技能的培训,更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塑造。只有不断提升青少年数智素养,使其拥有驾驭人工智能的智慧和坚守人类价值的勇气,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落地生根。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徐佑 王雯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的重大论断,明确了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这一重要部署,既体现我们党对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撑。

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认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从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再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成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厦的支柱性制度,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

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丰富和扩展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认识。“高水平”是一个新的历史维度,不仅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程度,更是指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作用,意味着我们要有更高水平的、成熟定型的、能够充分保障民族复兴伟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既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优势,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次伟大创新。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涵在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制度,也包括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还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这些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党和人民伟大创造的结晶。

核心问题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突破。

构建有效市场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有效市场需要高质量的经营主体、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支撑,这些都需要在政府“有形之手”的正确引导下才能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一观点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中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对立思维,为破解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这对关系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和效率,又要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目标。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根本要求。“放得活”体现在最大限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管得住”体现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国家经济命脉安全。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必须以政府宏观调控“有度”保障市场的机制“有效”,进而让微观主体“有活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就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最优平衡点,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公平、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经济体系。

重要保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现代化是资本驱动,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现代化路径,而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实际国情,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的、系统的、协调的现代化。高

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三者逻辑上内在统一、层层递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接服务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同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制度保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要素配置、科技创新动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这些都离不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撑。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成为改革开放的新课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制度型开放,涉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旨在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这要求我们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

实现路径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前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作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重要任务。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始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不断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对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增强经济实力具有关键作用。新时代深化国企改革,核心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提高自身竞争力,最大程度适应市场变化趋势。这既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坚守,也是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同时,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新时代需要营造适合非公有制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环境,打破市场壁垒,共享国家重大科研成果,促进城乡经济繁荣,扩大财政收入,增加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优化经济结构。

“两个毫不动摇”是相辅相成的,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既竞争又合作、既独立又联系、既优势互补又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能够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地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理论自信和实践自觉,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决策部署,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作者分别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本科生)

乡村振兴大家谈

“文艺赋美乡村”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2025年9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指出,扎实推进文艺创作、文艺服务、群众活动、人才帮扶、文化空间、产业赋能、学校美育、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宣传推广十大重点任务,更好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这为文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工作重点。为深入推进“文艺赋美乡村”工作,进一步深入相关政策与实践向纵深发展,我们开展了深入的走访调研。

云南省以文艺为抓手,多维度赋能乡村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文艺助力乡村育人,以志愿活动激发文化活力。近年来,云南省通过组建文艺小分队、选派文化志愿者等方式,深入乡镇开展免费文艺培训与演出,旨在加强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培养本土文化人才。同时,着力打造了“建设者之歌”农民文化节、“彩云裳”比赛及“文化大篷车·千乡万里程”惠民演出等一系列示范性、品牌性群众文化活动,有效激发了群众参与热情,提升了基层文艺队伍的水平。二是文艺为乡村画像,以精品力作展现时代风貌。通

过挖掘地方特色民族文化元素,云南创作出一批展现新时代乡村形象的文艺作品。例如,电影《一点就到家》、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分别生动刻画了乡村人民群像与田园生活之美,有效拉动了地方特产销售与旅游发展;普洱市澜沧县的原创民族舞蹈《摆出一个春天》登上央视春晚并获“群星奖”,有力展现了脱贫攻坚与民族团结的丰硕成果,增强了基层文化自信。三是文艺促乡村振兴,以民族特色拉动文旅发展。云南积极推动民族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澜沧县的大撒场村民小组将传统民居、农民画、绝版木刻等与乡村旅游、文创艺术深度融合;老达保村民小组则成立演艺公司,组织原生态实景演出,累计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逾千万元。这些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依托特色文艺促进产业发展、实现经济增收的有效路径。

调研发现,当前文艺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农民主体性缺失,内生动力不足。实践中存在将外来资本与文化资源视为振兴主体的误区,本土农民作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反而被边缘化,导致乡村文艺发展过度依赖外部力量,其内生活力未能有效激发。二是特色挖掘与作品质量有待提升。部分乡村文化遗产品类“符号化”,经模式化包装后呈现同质化展演。一些作品存在“主题先行”、表达生硬的问题,未能实现传统乡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独特魅力难以充分展现。三是产业融合与创新程度偏低。文艺创作、传播与新技术、新业态、新媒体的融合不足,尚未形成清晰、完整的产业链模式,限制了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实际效用的充分发挥。针对上述问题,本次调研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尊重农民主体性。一是尊重农民自身创造的文化,使农民成为表达者。近年来,多地农民自发组织开展“土味”十足的“乡村春晚”“村BA”等乡村文化实践,受到广泛欢迎。大力发展和扶持此类自发的文化实践,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让农民成为参与和表达的主体,助力乡土文化发展。二是发挥本地文艺人才的领头作用,使农民成为传承者。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文艺人才库,完善激励制度,鼓励本地文艺人才专业创业,挖掘培养本土文艺人才,培育新型文艺职业农民队伍。三是推动农民全方位参与文艺产业链,使农民成为受益者。支持农民参股文艺企业,充分发挥农民在文艺作品(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作用,充分发挥乡村文艺队线上直播带货作用,切实让农民受益。

挖掘文化独特性。一是依托本土文化,寻找创新表达。借鉴“浮梁茶创节”“宋井桃源乡游第一村”等为代表的在地化文化创新,通过赋予乡村文化当代内涵、表达方式年轻化、打开方式多元化等创新方法,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

活的连接点,有效激活乡村传统文化。二是依托业界力量,扶持精品创作。加强传统村落文艺的整理与利用,鼓励支持文艺工作者、文化企业、艺术院校、文联等部门深入传统村落采风、展演和对接帮扶,加强对乡村传统文化艺术的创编、提升,创作一批具有传统韵味、兼具时代感的文艺作品。三是依托资源集群,提炼特色品牌。立足得天独厚的的人文和自然资源,进一步打造“艺术家二居所”,加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塑造“一乡一艺”“一乡一品”特色品牌,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乡村文化名片,提升乡村文艺建设品质。

加强产业创新性。一是延长产业链条。依托有特色的文艺产品,延长产业链条,开发民间文化艺术研学游、体验游等产品和线路。二是大力发展数字文艺产品。鼓励数字文化企业发挥平台和技术优势,创作传播展现乡村特色文艺的数字文艺产品,开发线下沉浸式体验项目,带动乡村文艺传播、展示和消费。三是打造文化IP。充分运用动漫、文化综艺等产业形态,挖掘活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主题形象,带动地域宣传推广、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形象塑造。

【作者分别系云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云南省社科规划社会智库项目“新时代推动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SHKZ2023426)的研究成果]



本版主编: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电话:0871-64162931,64195021
邮箱:ynrb-llb@yndaily.com
更多理论评论文章、视频
请关注云南理论网、云南日报新理评微信公众号